

激进而保守的女性主义 ——英国作家乔治·爱略特研究

**George Eliot's Feminism:
Ideality and Reality**

龙艳 著

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术文库

激进而保守的女性主义 ——英国作家乔治·爱略特研究

George Eliot's Feminism:
Ideality and Reality

龙艳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激进而保守的女性主义：英国作家乔治·爱略特研究 / 龙艳著. —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8
ISBN 978 - 7 - 5600 - 7769 - 7

I. 激… II. 龙… III. 爱略特, G. (1819 ~ 1880)—文学研究
IV. I561.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351126 号

出版人：于春迟

责任编辑：朱云奇

封面设计：袁璐

出版发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址：<http://www.fltrp.com>

印刷：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650×980 1/16

印张：11.75

版次：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 - 7 - 5600 - 7769 - 7

定价：18.90 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010)88817519

物料号：177690001

高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旗帜， 始终奋进在时代前列

——“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术文库”总序

纪宝成

最近，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强调指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必须进一步提高对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性的认识，大力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党中央号召，一定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高度，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把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切实抓紧抓好，努力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更大发展。中国人民大学作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和高层次建设人才成长的摇篮，在党中央大力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的新形势下，将发挥更大的作用。67年来，中国人民大学广大师生发扬“始终奋进在时代前列”的优良传统，勤俭办学，艰苦奋斗，积极探索，求真务实，使学校成为我国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管理科学教育研究的重要基地，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普及，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江泽民总书记语，参见《光明日报》2002年4月29日第一版）。中国人民大学一定不辜负党中央的期望，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不断拿出无愧于时代的理论、文化成果，为使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有一个新的更大发展继续作出重要贡献。

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外国文化（含文学、语言、翻译理论、历史、哲学等）研究，属于我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部分。外国语学院设有英

语语言文学专业、日语语言文学专业、俄语语言文学专业、德语语言文学专业和法语语言文学专业,各专业都有一支具有较高学术水平、较高学历层次、职称和年龄结构合理、发展后劲很强的学术梯队;外国语学院的学者、教授们具有直接接触最新外文资料和信息的优势,应该在向今人学习、向古人学习、向国人学习、向洋人学习的基础上,在建设理论创新体系、推动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科研方法创新等方面发挥自己的重要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建立“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术文库”,旨在了解并进入世界学术研究最前沿、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为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做一些有益的工作。外国语学院将在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分期分批、有计划地撰写出版研究外国文学、外国文学批评理论、外国文化、外国文化理论、中外语互译理论、外国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外国历史、外国哲学、外国社会学等具有一定学术水准的学术专著。

这些专著虽然角度各异、文笔不同,但相信爱好外国语言、文学、历史、人文地理等领域知识的朋友会从中找到自己的兴趣点。特别是书中一些独到的见解和写作手法,富有启发,会给读者带来一些思考和启示。弗朗西斯·培根曾说:“读书可以怡情,可以添彩,可以长才。”如果“文库”能在这几个方面或其中一个方面对读者有所裨益,就达到了我们的目的。

最后,希望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学者、教授们与全校其他学科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们一道,肩负起历史重任,高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旗帜,勤奋工作,刻苦钻研,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努力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不断作出自己的贡献,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继续谱写新的篇章。

2004年3月31日

(纪宝成: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序

女权主义运动是近五六个世纪以来的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长期以来，女性作为人类的二分之一，不懈地要求发出自己的声音，为她们的存在、发展、平等、自由而奋斗。早在 15、16、17 世纪，女权主义浪潮就已涌动。通常意义上的第一次浪潮发生在 19 世纪。20 世纪 60 年代末，70 年代以及 80 年代初期达到第二次浪潮的高潮期。

女权主义的目标有一个转换过程：“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指 19 世纪、20 世纪——引者）的女性运动要求男女平等，这意味着女性想要分有父权制社会和思想的价值尺度；随后的转变是，女性根本拒绝父权制价值尺度，因为这些尺度本身包含着性别歧视。女性主义要推翻男性建立在其性别优势基础上的生命观、政治秩序和伦理规范，在自身（女性）的身体原则上重建世界观、生命观、政治秩序和价值观。”^① 女权主义颠覆父权制的本质（理性），冲破了男性中心主义；代之以女性的感性，这又落入了女性中心主义的窠臼。

龙艳的论著《激进而保守的女性主义》试图超越这种本质主义论。

19 世纪英国经典作家乔治·爱略特（1816—1880）地位特殊：既为男性中心的“正典”文学史所承认，又是女性文学创作的一块里程碑。论著从一个新的角度在乔治·爱略特作品中看到了超越本质主义——感性（女性的本质）、理性（男性的本质）——的一个超验范畴：神性，从而从根本上不同于以“男女二元对立”为依据的“平等”、“差异”“融构”说。

其基本论点是：由于女性生来就受制于以男性话语为价值中心的男权社会，所以受制于男权（父权、夫权），但“上帝”的神性启示可以使人获得重生，在这个绝对重生的境界中男女平等是可能的。因此，西方女性的反

^① 刘小枫中译本前言 p. 2—3, E. M. 温德尔：《女性主义神学景观》，刁承俊译（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95）。

抗必须以神性为终极依赖。但又由于男性话语盗用了神性的终极价值，把神性的绝对改造成了人性的相对，使女性反抗最终不能彻底。这就是导致女性最初反抗而最后沉默的重要原因。这个结论一方面涉及宗教的正功能——宗教的先知功能能够为社会抗议形成基础，另一方面也涉及宗教的负功能——宗教的教士功能阻挠知识的进步、对不义的抗议。^① 爱略特笔下的多位女主人公，也包括爱略特本人，都是以基督宗教为依据、基于唯信主义，反对父权的。

这样看来，爱略特的女性主义思想已经十分激进、明确了。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她却是个保守主义者，她甚至拒绝在妇女选举权请愿书上签名。爱略特对社会、政治深刻了解，使她将现实与对女性的强烈同情以保守主义的形式结合起来。

在爱略特看来，因为历史的原因，女性自己先天不足，她们的知识、学识不能适应现代民主的要求。她们没有足够的参政能力，更好地行使民主。爱略特并不反对女性获得选举权，而只是心存疑虑：如果女性没有足够的学识，担当民主参政的责任，就贸然提出她们的政治主张，这是否妥当？^② 爱略特借主人公菲利克斯的演说，全面阐述了她自己的政治观。这篇演说虽然针对工人，但也适用于激进女权运动：“这三项（知识、能力和诚实）是我们取得永久利益的保障，我们中任何一个能干的工人都知道：要造出一个值钱的东西，必须有好的发明或计划，准备好材料，还得有技能和实干，才能保证计划的实现。以此为标准，我们可以检验那些想领导我们的人。除了激愤的言语外，他们还能给我们什么？当他们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有这个、有那个时，他们能否说出有什么公平、合理、妥当的办法来得到这些东西？当他们赞同某种变革时，他们能否让我们仔细看看，这种变革是怎么取得的？”^③

爱略特用了一个比喻：社会是一株硕大的植物，只能慢慢长大，不能

① 孙尚扬：《宗教社会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p. 136。

② George Levine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Victorian Nove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40.

③ Thomas Pinney ed. *Essays of George Eliot*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imited, 1963), p. 417-8.

拔苗助长。妇女解放受制于社会观念、经济发展,不是通过一项法律可以彻底改变的。妇女运动不应过激,不应该与英国社会生活断裂、与传统秩序决裂。压制女性的旧观念、旧思想根深蒂固,变革人的思想要比变革法律难得多。

神法作为一种社会理想,是基督教社会衡量实在法是否正义的一项广泛标准,却有可能与实在法产生冲突。在二者对立的情况下,中世纪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主张,“对不正义的法律,可以有不同的态度。有的是决不能服从,有的可以在良心上不遵守,但为了避免诽谤和纷乱,还应遵守。”^① 爱略特的女性主义主张是从变革人的观念入手渐进式达到自由、平等、公正等全人类的永恒目标。

从激进宗教观、保守主义政治观双重角度探讨爱略特的女性主义,这在爱略特批评中颇具新意,拓宽了女性主义批评的视野,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此书是龙艳的第一本学术专著,是她数年研究、积淀、思考的成果。虽然几经修改,有些地方仍嫌生涩,如女性主义叙事理论未能充分展开、古典文学的分期是否合适、个别结论过于激进等等。希望龙艳以此书的出版为契机,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向更高水平的研究境地前进。

张中载

2007年10月26日
于北京外国语大学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托马斯·阿奎那”辞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p.597。

目 录

序	1
一、乔治·爱略特的女性主义写作	1
二、爱略特的宗教观	9
1. 爱略特作品的另一重世界——超越现实的神性景观	9
1. 1 两种现实主义	9
1. 2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流派与作为一种创作方法	13
1. 3 《亚当·贝德》中的失乐园与复乐园	17
2. 神性启示的反抗与男性神学的压制	24
2. 1 “永恒的女性”——神的影像	24
2. 2 神性对女主人公的启示	30
2. 3 从《圣经》中的男性神学话语看女性的沉默	42
2. 4 爱略特的新基要主义宗教观	52
3. 超越本质主义——感性、理性与神性	65
3. 1 以感性反理性	65
3. 1. 1 近、现代与女性主义的反理性	65
3. 1. 2 爱略特作品中感性的优位性	67
3. 1. 3 虚构权威——一种女性主义叙事	73
3. 1. 4 感性和理性的分蘖及男性女性本质主义 ..	75
3. 2 超越本质主义——神性是感性反理性的基础	81
4. 神性命名与命名权的男性话语压制	86
5. 爱略特眼中的信仰、价值和命名权	95
小结：安提戈涅的天条	109
三、爱略特的政治观	112
1. 爱略特的保守主义	112

1. 1 爱略特及其小说中的保守主义	112
1. 2 《激进者菲利克斯·霍尔德》与“菲利克斯·霍尔德对工人们的演讲”	121
2. 政治学视角下的极端民主	126
2. 1 近、现代英国及欧洲的极端民主时局	126
2. 2 政治学视角下的极端民主	131
3. 爱略特看社会——保守主义社会观	134
4. 爱略特解读欧洲人和欧洲生活的本源——传统	141
5. 爱略特看教育——行使民主的必要准备	146
四、爱略特对人类的强烈同情与对世俗政治事务的理解	153
1. 爱略特对人类的强烈同情	153
2. 爱略特对世俗政治事务的理解	161
五、结语	167
主要参考书目	169
后记	174

一、乔治·爱略特的女性主义写作

19世纪英国经典作家乔治·爱略特(1816—1880)在文学史上地位特殊：既为男性中心的“正典”文学史所承认，又是女性文学创作的一块里程碑。因此关于爱略特作品(如《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亚当·贝德》及《米德尔马契》)中女主人公的批评颇多争议。主要有两派意见：

其一：女主人公多为叛逆型，反对父权。波伏瓦说：“男主人公们——特别是汤姆，……固执地坚持公认的准则、婚姻道德、正式规矩；但麦琪给他们带来生活气息，她令他们不安。尽管极端孤独，却是一个真正自由的人，远离僵硬的男性世界。”^①麦琪虽死犹荣。

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格巴认为麦琪心中有反抗父权的强烈愿望，这种愿望在潜意识中通过认同反抗型女巫、吉卜赛人，被费利浦和斯蒂芬吸引等等曲折地表现出来。河流中的女巫同“阁楼上的疯女人”一样是反抗的化身。象征女巫的河水卷走、淹死了父权统治的暴君——汤姆。吉尔伯特和格巴认为麦琪极具反抗的疯狂性，是一个“决绝的天使”。^②《米德尔马契》中的多萝西娅、罗莎蒙德及卡苏朋的姨母、威尔的外祖母朱莉亚实际上结成了一个反抗父权中心的女性同盟。^③

其二：女主人公们并无多少反抗性，她们无一例外都顺从了父权。肖瓦尔特认为“波伏瓦将死亡误读成她的自由存在”。^④泽尔达·奥斯汀

^① Simone de Beauvoir. *The Second Sex*, trans. and ed. H. M. Parshley (Knopf,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53), p. 360.

^② Sandre M. Gillbert and Susan Gubar. *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The Woma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iterary Imagin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491.

^③ ibid., p. 499-519.

^④ Elaine Showalter. “The Greening of Sister George”, in Stuart Hutchinson, ed. *George Eliot: Critical Assessments*, Vol. 4 (East Sussex: Helm Information Ltd., 1996), p. 146.

(Zelda Austen)从女性主义批评家个人角度,认为:

女性主义批评家对乔治·爱略特不满,因为她不让《米德尔马契》中的多萝西娅·布鲁克做乔治·爱略特在现实生活中所做的事情:翻译、发表文章、编辑杂志、直到中年才结婚、做老姑娘过独立的生活、最后与不能同她正式结婚的男人公开同居。^①

女性主义批评家指责乔治·爱略特支持维多利亚文化的主流价值,是有一定道理的。在她的小说中,反传统的女性注定遭厄运。《亚当·贝德》中的海蒂·苏洛未婚生子,一定也是她杀了婴儿,最后自己也死了。《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的麦琪不信守婚约,又几乎与另一个男人私奔,最后在哥哥的怀中被洪水淹死了……在《米德尔马契》中,多萝西娅必须为她的理想受难、忍受可怕的婚姻、心灵的漫漫长夜,直至得到(另一场)幸福婚姻的回报。^②

凯特·米耶(Kate Millett)指出:“《米德尔马契》中,多萝西娅的困境是一个美好的心灵得到一份事业的诉求,但它不过是一个愿望而已。她同威尔·拉迪斯拉夫结婚除了找到一个好的伴侣,可以给他当秘书外,不可能指望从生活中得到更多。”^③ 乔治·爱略特是失去的领袖,她“活在革命(女权主义运动)之中,却不去写它”。

两派意见的核心是:爱略特作品是否归属于女性主义文学?如果是,那么女性主义文学的界定标准是什么?如果对其作品的分界有争议,争议的焦点在哪里?

从女性主义文学特点看爱略特的作品,首先必须对女性主义文学进行界定。女性主义文学并非仅仅指女性作家所写的作品。作为一种标举差异的另类写作,女性主义文学必须异于泛性别写作——即男性写作。既然女性主义文学是对抗思维的产物,那么反抗父权中心的政治性就是它应该

^① Zelda Austen, “Why Feminist Critics Are Angry with George Eliot” in Stuart Hutchinson, ed. *George Eliot: Critical Assessments*, Vol. 4 (East Sussex: Helm Information Ltd., 1996), p. 115.

^② 转引自Zelda Austen. “Why Feminist Critics Are Angry with George Eliot”, ibid., p. 116.

^③ ibid.

始终高扬的一面旗帜。

它强烈的对抗性、政治性来自于创作主体的“身份焦虑”。女作家拿起笔来从事写作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我是谁”，“我”该怎样下笔写作。吉尔伯特和格巴将这种困惑及不安总结为“身份焦虑”。“身份焦虑”修正了哈罗德·布鲁姆以男性文学传统为轴心的、俄狄浦斯式的文学史观。“身份焦虑”从女性作家作为独立创作主体的身份意识入手，消解颠覆以“超我”形式出现的父权制道德规范、价值取向、写作手法、语言运用等等。耶鲁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布鲁姆认为文学传统兴衰更迭，各领风骚数百年的主要原因，是后辈诗人如同俄狄浦斯情结中的儿子；前辈诗人或者说文学传统如同权威的父亲，后辈诗人生活在前辈诗人的巨大阴影、压力之下，焦虑不安；不打倒前辈的权威，后辈便不能自立、发展。自然，布鲁姆所谓的前辈诗人、后辈诗人都以男性诗人为参照系，在男性的泛性别化文学史中谈论这一问题的。女性主义文学，反抗的不仅仅是某一派或某几派的前辈诗人，而是以男性为中心的整个父权制文学传统。孟悦、戴锦华在《浮出历史地表》中指出：“写作是女性的一种自我拯救方式，是对那个还不是‘无’但行将成为‘无’的‘自我’的拯救，是对淹没在他人口语之下的女性之真的拯救。”^①因此，作为自我拯救方式的对抗并不仅仅表现为外在行动上的反叛，它还深深植根于意识及潜意识（即尚未被人们认识到的意识）的深层。

此外，古今中外，只要女性还处于父权制社会的统治之下，女性在行动层面上的反抗总是受到严格的限制和禁止。这样，就文学文本而言，女作家及女主人公在意识、潜意识层面的反抗尤其值得关注。女性被父权统治，处于父权社会的边缘地带。她这种被统治、受压迫的地位使她一方面有可能更多地在意识、潜意识层面与男性社会对抗，另一方面这种放逐导致游离于中心的边缘性，这种边缘性又使得她得以保持人类原初的思维特点——感性思维。从认知方式上看，女性认知多呈一种“目击道存”、直觉顿悟的感性认知。从古到今，理论家们从多方面证实了这一点。18世纪

^①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转引自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p. 208。

意大利哲学家维科提出著名的四喻说，即“隐”、“换”、“提”、“讽”四喻论（“metaphor”，“metonymy”，“synecdoche”，“irony”）。这四个修辞格实际上是人类认知发展过程的四个阶段，即“同中见异”、“分离相邻”、“整体部分”、“言语相异”。^① 从表面上看，人类是在逐步深入地认识世界，从简单、直观的形象认识进入独立、抽象的概念认识。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类洋洋自得、自以为掌握了世界真谛之时，却正是他们日渐疏远、背离万物之际。通过“隐”、“换”、“提”、“讽”四个认知阶段，人类一步一步脱离了自己与万物心灵认同的原初阶段，而进入一个视自然为陌路，甚至是敌人的相隔阶段。而儿童、女性由于处在以男性为中心的人类社会的边缘地带，较少受到惯常认知方式的同化污染，仍能与万物直接沟通，保持心灵的纯洁。华兹华斯感叹，随着儿童等边缘化人群一天天长大成人，他们与生俱来、上帝赋予的灵光也一天天消逝了。华兹华斯的感叹与维科的理性分析互相印证。人类工业化造成的危害、两次世界大战的残酷，使人类的理性遭到普遍怀疑。这时，强调女性葆有的感性认识、其深层意涵及意识、潜意识层面的反抗具有重大意义。

总之，女性主义文学，作为强调社会意义上的性别(gender)写作，必须有一个轴心，这个轴心就是反叛、反抗，无论这种反叛的形式涉及行动意识、潜意识的哪一个层面。反抗、反叛是女性主义文学的底线标准。将社会意义上的 gender 与自然生理意义上的 sex 区别开来，这本身即鲜明地表现出对人们习以为常的性别状况的反思。“性别在文学中的影响与作用……是以男性和女性(的)社会存在的不平等、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为前提的”。^② 因此，张岩冰将女性主义文学归纳为“一定是一种属于女性的抗拒父权制压抑和压制的经验”。^③

那些不赞同乔治·爱略特作品是女性主义文学的观点，主要基于肖瓦尔特的理论。这位当代女性主义批评家是从女性反抗的最高阶段，回望女性主义文学传统。在这样一种居高临下的审视中，女性文化传统被她分为

① 转引自徐贲：《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p. 14。

② 朱虹：《妇女文学——广阔的天地》，转引自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p. 200。

③ 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同上，p. 105。

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女人气”阶段(feminine)。“从1840年出现男性笔名开始,到1880年艾(爱)略特去世为止,”主要特点是受男性主导标准和价值的控制,“将主导传统的艺术标准及关于社会作用的观点”内在化。第二阶段为“女权主义阶段”(feminist)。主要特点是从二元对立的立场出发,将男性中心作为反对的目标和打倒的对象,力争女性的权力、价值。“女权主义阶段从1880年延续到1920年或到女性获得选举权那一年”。第三阶段是“女性”阶段(female)。女性作为独立主体,已摆脱了对立面——男性的依赖,开始树立女性自己的旗帜,走上发现自我、表现自我的道路。“女性阶段指1920年到现在”。^①

肖瓦尔特的分期,有女性主义史的高致,却无人乎其内的细察,因此也就没有中国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所说的“理解之同情”。这一缺陷在对“女人气”阶段的界定与总结中尤为突出。肖瓦尔特将女人气阶段的特点归纳为“顺从”、“摹仿”、“内化”。实际上,女人气阶段的作品如果被还原以历史语境,还以公正,它们中的佼佼者也有“反抗”、也有“独立”的特色。公认态度温和、服膺于男性创作传统的奥斯汀,在《傲慢与偏见》中,通过女主人公伊丽莎白与贵妇凯瑟琳的对话,就表达了求“平等”的反抗意向:“He [Darcy] is a gentleman; I'm a gentleman's daughter.”奥斯汀的温讽,其描写女性内心的心理转向及细腻、绵长的语言特色,虽然不像当代法国女性主义者要求的那样完全、彻底地颠覆语言,在当时维多利亚父权中心的历史条件下,也有削弱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积极意义。波伏瓦就把简·奥斯汀、乔治·爱略特归入“参加暴动起身的女性”。希德尼·凯普兰(Sydney Kaplan)从历史语境角度对肖瓦尔特所做的批评也许不无道理。她认为“肖瓦尔特倾向于以20世纪后期自我发展和性觉醒的理想为参照系来衡量她研究的女性作家,因此在她看来,20世纪60年代以前写作的所有妇女对她来讲都没有获得完全成功……作为一个持历史方法的批评家,肖瓦尔特自己时常看上去奇怪地违背历史性”。^② 肖瓦尔

^① Elaine Showalter, *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 转引自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p. 75。

^② Sydney Janet Kaplan. *Varieties of Feminist Criticism*, 转引自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同上, p. 76。

特后来也承认，自己在作品中所设立的发掘女性文学影响的承继关系的假设模式应该被视作一种特定历史时期的策略而非绝对的教条。^①

那些指责爱略特作品中的女主人翁们无多少反抗性的现当代女性主义批评家(如凯特·米耶，泽尔达·奥斯汀文中的李·爱德华兹)犯了与肖瓦尔特相同的非历史性的错误。她们忽略了爱略特作品的历史语境——维多利亚时代，当时即使才华横溢、心比天高的女性，也无法挣脱其悲剧命运。约翰·福尔斯(John Fowles)的《法国中尉的女人》、伍尔芙《自己的一间屋》中均极力描写那个时代女性的不自由。这些论者忽略了反抗除了有行动的显性层面，还有意识、无意识的隐性层面。《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麦琪三次出走(去吉卜赛营地，去红苑同赛利浦约会，同斯蒂芬私奔)，《亚当·贝德》中黛娜站出来布道，《米德尔马契》中多萝西娅在田庄里开办幼儿园，拟建村舍为农民造福，及在罗马、在洛伊克家中，就遗产、遗嘱问题违背丈夫意志，这在当时维多利亚的特殊历史语境中是难以想像的大胆、叛逆。反之，沉默派女性主义批评家们忽略爱略特作品的反叛性，只看到女主人公们的悲剧结局，却忽略了她们在此之前的挣扎与反抗。沉默派最核心的是忽略了爱略特作品中的另一重反叛景观：来自十字架上的对世俗的救恩、价值、命名的彻底质疑和批判。启示真理照亮了生存困境中的女性。彼岸对此岸的批判是其女主人公们一切反抗行为的动力。

那些只赞扬女主人公们反抗的反抗派女性主义批评家，如波伏瓦、吉尔伯特和格巴显然没有看到她们的最后沉默：她们的反抗是有限的、不彻底的。她们反抗一次，妥协一次；再反抗、再妥协，最终沉默。虽然吉尔伯特和格巴也指出汤姆、卡苏朋等人分别对麦琪、多萝西娅的压制，但其论述仅仅停留在压制的表面。她们认为最终女主人公是以反抗胜利(如汤姆被女巫的洪水淹死)或虽败犹荣(如：多萝西娅与罗莎蒙德联手，傲视男性世界)。伍尔芙的意见就与她们不同，她说“尽管女主人公们的努力无尚勇敢，她们的斗争最终以悲剧或比悲剧更让人感到压抑的妥协结束。”^②

吉尔伯特和格巴认为，弗洛斯河如同它的名字所暗示的那样，是各种

^① Elaine Showalter著：《她们自己的文学》，增补版(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金莉导读 p. 6，及作者的增补版序言 xi。

^② 伍尔芙：《书和画像》，刘炳善译(北京三联书店，1994)，p. 143。

线、点织成的网，而座落于河上的磨坊，其任务是把原生态的、自然的小麦磨成人们食用的面粉。参与织网的人有麦琪的姨妈们，还有奥格镇上传播流言的居民。可惜，吉尔伯特和格巴没有继续深究这些针对女性的细密之网。她们重点揭示疯女人、巫婆的多重表象，对精神层面较少探索。她们未能深究女主人公们反抗后沉默的深层原因——男性话语控制。男性用所谓的理性：历史理性、经验理性、科学理性扼杀启示真理，以男性主流社会改造过的伪真理取代十字架上普世的绝对真理，从原初的命名、成长中的价值和终极的救恩等全方位阻断神圣的亮光，最终导致了反叛女性的沉默。

反叛和反叛后的沉默，是爱略特作品中女主人公的特点，也是她女性主义文学的特点。在她的知名作品《亚当·贝德》、《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米德尔马契》。这三部作品中，女主人公以反叛始，以沉默终。她们最终的归宿是“沉默”：无语、无闻、死亡。所谓“沉默”其字面意义就是一言不发，不说话，不出声。当代法国思想家福柯的话语理论赋予了“沉默”二字社会历史上的意义。“沉默”指由于社会历史的局限，不能说或想不到说，从而失去了为自己辩护，为自己表明心迹的说话机会，结果沦为一个任由他人界定、评说的空洞能指。女性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失语，在各国史册上的默默无闻，不是因为她们没有自己的历史，而是她们无由说出自己的历史。女性是一个被剥夺了话语权的受压制的性别。

爱略特本人在现实生活中蔑视世俗，言行惊人。她讥讽简·爱重名薄情，指责简·爱过于看重罗切斯特之妻的名份，宁肯为了一个徒有虚名的称谓，放弃一个活生生的男人和真挚的爱情。乔治·爱略特说：“自我牺牲固然好，但总得有点价值，不该是为了尊重那种把男人灵与肉拴在一具腐烂僵尸上的法条。”^① 爱略特行如其言，重情薄名，对世俗偏见不屑一顾，在乔治·路易斯无法同与他人私通的妻子离婚之时，毅然同他结合，终其一生，相伴左右，甘心作伴侣而非妻室。

现实生活中，爱略特的勇气有一个源头——基督信仰。尽管她断绝了

^① 转引自朱虹译本序，乔治·爱略特：《米德尔马契》（上、下），项星耀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p. 2。亦见 Gordon S. Haight ed. *Selections from George Eliot's Letter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51.